

CH 1

緒論

壹、總覽

1

身為社會中的個體，對於現代歷史中的重要事件，我們傾向以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報導來記憶他們。當代社會中的每一個世代，都擁有一套與關鍵政治時刻連結在一起的影像與文字，從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遭到暗殺，到九一一攻擊事件時飛機衝撞世貿中心的影像，延伸到西方軍人在巴格達大街上的景象。作為群居的社會，我們彼此透過大眾媒介來溝通、共享並且嘗試接受與處理政治事件。同時，大部分的人也都瞭解到在政治與大眾媒介之間，存在著許多篩選過濾的機制。在某些國家，其大眾媒介的報導更著重於輕鬆的報導(light news)以及娛樂新聞，而這樣的作法就必須犧牲嚴肅的政治性分析。而其他某些地方，國營或公共的媒體獨攬大權，其報導方式非常著重於整體社會的需求，而非商業營利的需求。大多時候，媒體的觀眾、聽眾與讀者都相當滿足於他們從大眾媒體接收到的東西。儘管如此，在改革與危機發生之時，這些時刻包括從選舉、

2

恐怖主義的行動、戰爭，到政權的崩潰；公民們就會發現他們自己非常需要來自大眾媒體的慰藉、資訊甚至是領導。

我們要如何瞭解存在於現代大眾媒體與政治領域之間的變動關係呢？這種關係是複雜的，但卻相當吸引人，因此幾十

年以來都有許多學者與分析家參與其中。就學界的發展來看，其間提出了許多有用的見解，深入分析了政治、媒體與公民之間的關係，這類型的分析跨越了不同的學科與主題領域。在這些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都傾向將焦點放在單一國家之上，因而使得這些研究難以參透跨國或國際性的模式。因此，對於那些為大眾媒介在政治領域中的權力感到困惑的學生們來說，要曉得從這個領域的何處開始著手進行深入的研究，通常會是一大挑戰。

本書的用意，是將廣泛的理論與分析結合在一起，其目的是為了整合出一套對媒介與政治這個領域的介紹。其特別之處在於，本書內容所構思的方向，是為了強化比較媒介研究這個領域，其內容藉由提供超過對單一國家之媒介與政治體制的描述，來聚焦於大眾媒體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相對地，這樣的寫作概念是為了使我們能夠以一個更廣泛、更概括性的方式來瞭解這樣的關係是如何運作。綜觀全書，其內容強調將相關的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應用在媒介與政治的研究上。在媒介與政治這個主題的比較分析中，有兩項核心且重要的挑戰。首先，其論述的方式必須從描述性的方式轉變成分析性的方式。換言之，我們如果只瞭解美國大部分的電視頻道是由商業組織來運作，而英國主要的電視頻道是一個公共組織，這樣的理解是完全不夠的。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理解的是，這兩種運作方式之間所產生的差異為何？這是否意味著，在這些媒體中製作新聞的記者們，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工作？其廣播或放送的內容是多麼地不同？而美國與英國的觀眾或聽眾們，對他們自己的電視頻道又有著什麼想法呢？美國人是否會比較偏好擁有一個有影響力的公共電視台，或者說英國的觀眾們是否真的嚮往一種比較商業化的電視頻道呢？當由商業電視或公共電視所主導的體制面對到危機如恐怖主義、戰爭、尖酸刻薄的選舉活動，或者是由發展中之科技所造成的重大變遷時，他們又會如何反應

呢？究竟哪一種體制才會促發更多負責任的公民呢？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沒有進行相關的研究，那麼我們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這不只是因為這些問題會引發公民們(與媒介組織)的興趣，同時也是因為這些問題本身就是更大難題中的一部份。就不同的媒介體制來說，其各自的強項與弱點究竟有哪些？是否有特定的媒介體制能夠更有效地支持民主制度呢？同樣地，是否有某些類型的媒介體制，試圖推翻或破壞民主制度呢？本書的內容將會提供學生分析這些問題的相關資訊。這本書將著重以比較性的觀點來討論廣播、印刷出版與網路媒介，其大部分的討論基礎將放在對美國與英國這兩個具有影響力之媒介體制的分析。而本書也將特別著重在發送新聞的管道上。此外，本書也採用許多從其他國家取得的個案研究與資訊，特別是從俄羅斯聯邦(Russian Federation)與其他非自由國家(non-free states)觀察其複雜的媒介領域，來論證在非民主制度的國家中，媒介組織是如何運作的。本書也努力取得關於這些體制如何運作與其重要事蹟之足夠的事實資訊，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以分析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局勢。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理解在某個國家中被接受為現狀的運作方式，在另一個國家可能會被視為侵害了所謂良善的新聞專業規範。不論是媒介的體制、媒介報導的內容，或是媒介閱聽人，在不同的國家都會有不同的樣態。本書也試圖尋找媒介與政治之間互動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來獲得常態化的結論。舉例來說，如果我們沒有同時觀察一個允許付費政治宣傳廣告的國家以及一個不允許付費的國家，我們很難理解究竟付費的政治宣傳廣告對民主制度是否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本章將首先比較媒介與政治的討論，配合簡介論述媒介是如何與政治世界產生關係的不同模式。另外，本書後續的章節也將呈現媒介與政治之間關係的關鍵論點，包括新聞的製作、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閱聽人的特色、選舉、戰爭報導、恐怖主

義以及網路。其論述的方式會先介紹每一個主要概念，之後再呈現美國、英國、俄羅斯與其他國家的重要範例。隨後這些討論也將鼓勵讀者們發展出自己的理解，去弄清楚在這些國家當中的媒介體制，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以及相似性的程度為何，並且釐清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性與相似性。本書的每一個章節也將提供一核心論點的概要說明、研究問題、參考書目以及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素材的相關網站。本書每一個章節的目標都是為了「啟動」讀者們的分析性思考，讓學生與研究者有能力評估這些概念，並且各自完成他們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

貳、研究媒介與政治：我們應該先觀看什麼？

在研究媒介與政治這個主題時，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面向，就是我們必須非常清楚是在對哪一個關係中的因素進行分析。尤其，我們必須釐清我們檢視的究竟是媒介對政治所產生的影響，抑或是政治體制對大眾媒介所產生的影響？就第一個問題來看，舉例來說，可能有人感興趣的重點在於電視報導對美國二〇〇四年之總統大選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換句話說，他關注的重點在於電視對選民如何選擇投票，究竟會產生多大的差異，不論是新聞報導、付費的政治宣傳廣告或者是透過電視頻道所放送的政治辯論？然而，很清楚地，我們都知道還有許多影響投票選擇的變數，例如選民的政黨傾向、他們的經濟情況、他們的居住地點以及其他相關的因素。在影響投票選擇的過程中，媒介的報導可能只是其中一項因素。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轉換這個問題，進而質問電視本身是如何被廣泛的政治因素所影響。就這個問題來說，我們可能會選擇進行的研究

4 是，在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期間中，針對小布希與凱瑞陣營之間選舉新聞報導方式的改變。一旦我們觀測到選舉活動的報導

是如何變化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探討究竟是哪些因素，例如電視辯論、伊拉克戰爭報導、可能產生之新安全威脅、暗示性醜聞等，可能會改變媒體報導的走向。因此，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觀點來研究媒介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一旦我們弄清楚是在研究媒介對政治本質的衝擊，還是政治對媒介造成的影響，那麼我們需要去思考的是，我們檢視的是媒介領域中的哪一個部分。一般而論，本書將媒介領域劃分為三個主要的範疇。第一個範疇是新聞產製(news production)，與這個範疇產生關連的是在某一特定國家中，所有包含由媒介創造，經由廣播、報紙、網路等管道發出訊息的因素。這包含該國家的政治環境、媒介規範、媒介管制、媒介管道的所有權，以及新聞工作者與公共關係工作者如何執行他們各自的工作。第二個檢視媒體與政治研究的廣泛範疇之重點在其內容。這個部分包含研究這些媒介，例如電視新聞、報紙的消息、廣播以及網站，實際上傳遞或印刷的內容究竟為何。第三個範疇是所謂的閱聽人，重點在於分析人們對於他們從大眾媒介中所見、所聽、所讀的東西是如何反應的。如果我們能夠將媒介與政治的研究劃分為這三大範疇，那麼要以比較性的觀點來審視媒介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就會變得相當容易了。

在此讓我們先回到上面所提到的選舉報導例子，新聞產製的第一個研究範疇涉及到所有影響新聞如何產製的因素。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媒介組織的所有權人，對報紙每天的編輯會議究竟是否具有影響力。除此之外，尚可研究記者挑選哪些事件以進行報導，以及他們最常採用的消息來源。我們可以比較美國記者與英國記者在追蹤選舉活動與候選人消息時的差異。對其進行內容研究相對來說是比較直接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比較花費時間的。這些內容通常包含針對特定議題、人物或主題之報導的判定。然而，對於電視所播放的內容進行分析，可能是相當困難的，這是因為一系列的影像及播放的細微

差異(更遑論錄製或重新檢閱內容所需要的時間及所遇到的麻煩了)。最後，我們必須關注的是觀眾與聽眾們對新聞內容作何反應？難道人們都不加思索就接受這些播放出來的消息嗎？他們接收到的是哪些部分，而他們忽略的又是哪些部分？他們是否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新聞中的偏頗與偏差所影響呢？而他們信任的又是哪些媒介資源呢？在全國性危機中，例如在恐怖主義行動之後或在戰爭期間，他們會向哪裡回報消息呢？舉例來說，美國人民和俄羅斯人民是否都預期著同樣的恐怖主義行動報導呢？這種報導是否讓人民在面對到一個安全威脅時，更能夠感到安全，抑或是感到更為脆弱呢？最後，這些觀眾的反應又是如何支配新聞產製者計畫他們的報導呢？

然而，這種三階段的媒介產出模式，包括環境、內容與閱聽人，這種模式並非靜止不變的。媒介環境及其產出所受到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將主導透過媒介管道而製作出來的消息內容類型。即便是在同一個國家中，有兩個媒介組織都透過管道在播放同樣的事件，在其播報的風格上，至少都會有些微的差異。然而，在不同體制中的許多媒介，不論是在美國、英國或俄羅斯，當他們在呈現與恐怖主義、戰爭、選舉或重大事件的相關報導時，事實上，通常他們都會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我們要思考的是，哪一種是最民主的方式？這種方式對報導內容造成什麼影響？舉例來說，比起美國的選舉新聞，英國的選舉新聞更著重議題本身；然而，在俄羅斯，選舉報導已經逐漸變成一種偏差且徒具政治宣傳的形式。相對地，報導的內容也主導了觀眾或聽眾回應的程度。美國的觀眾可能會發現英國廣播電視公司的新聞是走穩重路線的，但同時英國的觀眾也必然會發現，美國的地方電視新聞內容根本就是瑣碎不重要且過度八卦的。某位觀眾可能會預期並樂見在戰爭的相關報導中，必須使用某種程度的審查權；然而另一位觀眾可能會覺得，就戰地記者之角色進行某種程度的偽裝，等於侵害了他們

自身的公民權。如果我們能以比較的觀點來探討媒介組織或管道的觀眾或聽眾，很快地就會揭露不同國家的人民，對於媒介的規範與期待有著極大差異。因此，這亦會反過來影響三階段分析模式中的第一個因素，也就是新聞的產出。那些產製新聞的人都瞭解觀眾或聽眾的期待，並且應該試圖滿足閱聽眾作為消費者或公民的需求，或是結合這兩種身份角色的需求。

參、媒介與政治的古典模式

觀察人們如何概念化媒介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很有幫助的，另外也很重要，我們仍可以彈性地對不同類型之媒介環境、內容與閱聽人提出解釋。在許多古典的討論方式中，其中一項試圖形塑大眾媒介的重要討論方式，來自於學者塞伯特等人(Siebert, 1963)的研究。他們將世界上的媒介劃分為四種模式，分別為：自由主義式(libertarian)、社會責任式(socially responsible)、極權主義式(authoritarian)以及蘇維埃式(Soviet)。塞伯特以及他的同僚認為蘇維埃新聞模式要求新聞媒體必須支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式(Marxist-Leninist)的現實觀點；極權主義模式要求新聞媒體必須完全服從於國家的指示；自由主義模式支持意見輿論必須自由傳播的觀念；而社會責任模式則認為媒介組織應該主動積極地運作，在其報導中涵蓋所有社會層面(參見表 1.1)。

雖然這些模式曾經被批判為稍嫌簡化，並且被視為冷戰下的產物，但這些模式對於以一種概括的方式來討論媒介與公眾之間的關係，的確提出了一個有幫助的起點。這些模式全都代表了「理想的」(ideal)情境，而這些情境是相對於現實的媒介體制。然而，《新聞媒介的四種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這本書的作者們，在發展每一種模式的過程中，確實在心中有

6 表 1.1：媒介體制的古典模式

模式	定義
自由主義模式 (商業式)	媒介組織可以自由出版發行他們所喜歡的東西。攻擊政府的行為是被允許的，為了更好的社會利益，甚至鼓勵這種行為。記者與媒介組織被賦予完整的自主權。
社會責任模式	媒介組織並無法完全隨心所欲自由地出版發行，因為他們對社會負有特定的義務，必須提供資訊與平衡。媒介組織必須提供所有團體都能獲得相關資訊的管道。媒介組織與政府共同作為建構文明社會的伙伴。
極權主義式	媒介組織必須經由直接的政府控管滿足國家的需求。不允許媒介組織印刷或播送任何可能破壞既定權威體制，或侵犯既存之政治價值的內容。如果有破壞規則的媒介組織，一旦被發現，就必須受到審查與懲罰的管制。
蘇維埃式	理論上，媒介組織是為了勞工階級的利益而運作的，而其限制/審查權的觀念，則是透過與勞工團結在一起的記者的覺醒所賦予的。在實際運作上，國家以極權主義模式掌控蘇維埃式媒體。

資料來源：摘自 Siebert, Peterson and Schramm (1963)

構築某些特定國家的運作方式；而這些模式對於理解媒介體制的廣泛基質，的確是有所幫助的。其所提出的自由主義模式與美國的媒介市場相似，而社會責任模式則與英國廣播單位的運作方式接近。然而，即便有這些配對成功的例子，在每一個國家中還是有一些令人關注的例外；比較知名的是英國的小報 (tabloid newspapers) 為了追求更多的銷售量，會不斷地去挖掘政商名流的醜聞或散播不實謠言。這樣的運作方式將使英國的小報接近於自由主義模式而非社會責任模式。雖然蘇聯體制已經崩解了，但蘇維埃式的運作方式，對瞭解許多後蘇聯國家 (post-Soviet states) 媒介，作為公民社會支柱一角時的不良表現，仍相當有幫助(更不用說當今的中國了)。最後，極權主義

模式至今在世界上仍存在著，包括伊朗與緬甸^①。

在這些分析媒介體制的相關論者中，大部分的討論若非著重於自由主義模式，就是把焦點放在社會責任模式。究竟其中一種體制是否比另外一種體制更好呢？可以預料的是，國家總是傾向贊同自己所採用的模式，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就這兩種體制來說，以媒介組織在民主制度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還是有其各自的優勢與弱點(參見表 1.2)。舉例來說，自由主義體制被認為是受到消費者需求所驅使的，因此在自由社會中，新聞媒體首要任務就是提供一般大眾有關重大當前事件的資訊，以及休閒娛樂方面的消息。自由主義模式也通常被指稱為所謂的新聞「商業」模式。任何看似對閱聽人來說為有趣且重要的事件，都有可能成為所謂的新聞。在這種模式中，新聞必須以迅速、準確且沒有試圖隱含任何特定觀點的形式進行播報。至於閱聽人要相信什麼，或質疑什麼，那就留待群眾們自行決定。自由主義式的媒介體制削弱了媒介組織作為政治「守門人」的權力，使得媒介組織之所有權與新聞從業人員的偏差顯得較為不重要。

如果這個體制是消費者導向的(consumer-driven)，那麼相對而言，這個體制實際上是很不容易被操控的，不論想要對其進行操控的是某強而有力的菁英團體，或是沒有組織的群眾都一樣。這樣的體制非常信任閱聽人本身的選擇，讓群眾們自行決定哪些新聞是重要的，並且自行彙集有關整個社會的重要訊息。然而，這種對群眾的高度信任可能會引發某些問題，因為相關研究顯示出人們通常總是會挑選休閒娛樂的議題而非嚴肅的議題。此外，沒有經過體制篩檢的新聞可能導致大眾的恐慌、不安甚至造成危機，例如一九九二年發生於洛杉磯的嚴

①：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所作出的媒體自由度評比(參見 www.rst.org)。

7 表 1.2：比較自由主義與社會責任模式

	自由主義模式	社會責任模式
定義	受到消費者的需求所驅動，通常被稱為「商業」模式。在自由社會中，新聞媒介的首要任務，就是提供一般大眾有關當前重大事件及休閒娛樂的資訊。任何對閱聽人來說有趣或重要的消息都有可能成為新聞。這些新聞必須以迅速、確實與輿論自由的形式來播報。留待閱聽人自行決定要相信什麼與質疑什麼。	新聞產製者設計輸出的新聞，目的是為了支持公民社會，並且反對反社會的行為。媒介組織所輸出的消息應該反映社會的關注。媒介組織應該加強政治行動並且公佈社會之惡。媒介組織不應該播送不為社會所欲的觀點與遭質疑的控訴，即便這些新聞具有煽動性。在必要的時候，媒介組織應當負起管理責任。
閱聽人的角色	可以吸收所有的訊息並且決定哪些是重要的。	必須被賦予資訊以促進其行動的責任。
媒介組織的角色	提供所有被視為會引發關注的訊息。	以負責的方式提供資訊。
對閱聽人的首要認知為	消費者	公民
對記者的首要認知為	資訊的提供者	守門人
大部分遵循這個模式的國家	美國 雖然在戰時或恐怖主義以美國為攻擊目標的時候，會比較傾向社會責任模式。	英國 雖然其小報遵循的是自由主義式的模式，就像某些商業電視的播送一樣。

- 重暴動，就是由廣播新聞所點燃的，因為新聞播送了殘忍毆打黑人駕駛羅德尼 金(Rodney King)的白人警察被宣判無罪。我們有正當的理由，可以證明這些未經篩檢的資訊，一旦被釋出之後，因為沒有顧及其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問題。從短期的角度來看，這些衝擊可能代表了暴力。但從長期的角度來看，這也可能意味著社會當中理性思維的腐蝕。

然而，社會責任的媒介模式，應該要藉由對社會中資訊之使用提出一個更為深思熟慮的政策，來注意到這類問題。社會責任的新聞模式認為新聞的產製者設計其新聞產出的目的，是為了支持公民社會的運作，並且阻擋反社會行為的發生(Negrine, 1994)。或者，就像學者葛瑞伯(Graber, 2005: 22)所提出的，「遵循社會責任模式之原則的人，他們相信由大眾媒介所呈現之新聞與休閒娛樂的消息，應該反映的是社會的關注」。而這樣的運作方式使得大眾媒介變成了公共福利的守護者，其「在有必要公諸社會惡行時，應該要促進相關的政治行動」(例如防範核子污染或阻止虐待兒童)。媒介組織不應該播送不為社會所欲的觀點以及值得懷疑的指控，即使這些消息是具有煽動性的。然而，如果媒介組織相信政府隱瞞了對社會大眾甚為重要的資訊時，記者也應該試圖找出那些資訊並且將其公諸於世。

當我們將社會責任模式與百無禁忌的自由主義式模式兩相比較時，我們可以發現社會責任模式的好處是相當明顯的。社會責任模式提供社會某種程度的保護，免於接受從低俗品味到可能導致恐慌或暴力的所有資訊。它保護公眾免於接受具有破壞性、被扭曲或危險的資訊。總體來說，社會責任模式運作之目的是為了建構出一個社會共識，而自由主義對同樣新聞的報導可能會破壞那種和諧。這種社會責任的媒介模式，有助於我們維持一種共善的意識(a sense of common good)；甚至可能可以建立一種國家意識。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剝奪了公民取得完整資訊採取行動的權利，即便這樣的作法可能會導致不正義或暴力，並且也給予媒介組織更多的權力來分配社會中的資訊。如果媒體扮演了更大的「守門」角色，那麼公民們就更容易處於資訊宰制或被其他力量，例如政府所控制的風險中。

許多現代政治傳播的學者都拒絕接受由塞伯特等人

(Siebert, 1963)所發展出來的模式。舉例來說，學者班奈特(Bennett, 2000: 204)發現當我們在評估媒體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時，從媒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角度思考是比較有用的。班奈特從學者路克斯(Lukes, 1994)對存在於社會中的權力分類，汲取了三種認知政治權力的面向：人們對於影響他們的政治行動，要不就是接受它們並將其視為正當的；要不就是抗拒它們；要不就是順從它們，讓自己處於完全沒有力量的態勢。而媒介組織能夠以三種方式投入這些概念中。首先，媒介組織可以在社會中構築高壓強制性的力量，以「鼓勵、阻止、隱藏或暴露這些力量」的方式(Bennett, 2000: 205)。此外，媒介組織在他們正式的政治報導中，可以採取選擇性的作法，只報導某些政客的消息及他們的活動，忽略其他人的新聞。最後，媒介組織對於「傳遞價值、問題的定義以及人們在社會中的形象，提供人們思考其生命以及其與政府、政治與社會的關係」來說是相當重要的(ibid.)。最後這項定義在一個轉型社會中尤其重要，所謂的轉型社會，指的是某個曾經是極權體制但現在民主制度仍相當脆弱的國家。然而，同樣也會造成危險的是，強調價值意識可能會分化人民或無法促進公民社會；例如強調主流團體的國族主義或忽略大眾偏好的強大領導人，就可能對公民社會的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

然而，如果大眾媒介選擇嘗試以過度激烈的方式來挑戰社會上多數人的信念，進而「領導」他們所面對的閱聽人時，他們就必須冒著喪失群眾關注與信任的風險。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因為通常要去判斷群眾的意見或情緒是困難的，特別是當記者逐漸在某種程度上與一般的公民產生疏離時。此外，公共與商業性質的媒介輸出是無法單獨行動而避免競爭的。即使他們的資金結構容許他們忽視短期的大眾潮流(就技術上而言，這種現象的確出現於英國廣播電視公司的運作中)，但如果他們在某個點上喪失了群眾的支持，無法與

多數的群眾進行訊息的溝通，那麼這些媒介組織就會變得邊緣化。當然，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可以說明媒介組織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與傳統。以美國媒體來說，雖然社會上逐漸關注所謂「兼具資訊與娛樂」(infotainment)的節目，但媒介組織仍然投入相當多的資源來製作選舉的報導。相對地，英國廣播電視公司仍持續報導正式的國家場合，例如西敏寺國會的開議，以及在陣亡將士紀念日(Remembrance Day)時向在戰爭中喪生之軍人獻花的影像，儘管這些報導缺乏有力的觀賞價值。這樣的看法為學者舒德森(Schudson, 1995)的研究所支持，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主張，也就是媒介與文化是相互纏繞在一起的，而我們如果不去瞭解媒介體制的歷史與文化基質，將完全不可能理解整個媒介體制。

當被視為所謂「傳統」的體制，被特定團體或政府的某個單位操弄地過度開放而無法掌控時，就會引發社會的關注，前者可能如具有領袖魅力的領導者以及他或她的追隨者。這個議題也與更大的問題相結合，也就是有關媒體所有權的辯論。在歐洲的一般共識是，由國家或公共資助的電視頻道對社會來說是重要的，但對於國家對新聞播送頻道的控制確有相當嚴重的爭議。此外，美國媒體在選舉中的角色也受到廣泛的批判，許多人認為媒體對選情的報導不過就是將其當作「賽馬」運動來看，因此候選人已經越來越少有時間能夠為自己發聲(Patterson, 1994)。按理說，美國的媒介組織延續了報導選舉的傳統，然而卻提供給投票人更沒有幫助且偏差程度更大的資訊。如果像英國與美國這樣擁有既定民主制度與媒介體制的國家，都必須面對開放和管制的嚴重問題，那麼對於比較不民主的體制或國家來說，問題就會更為明顯。學者史帕克斯(Sparks, 2000)認為所有有關公共媒介與商業媒介的論述都忽略了這個重點。他認為關於媒介與社會的討論應該由對公共與商業媒介的審視出發，來重新排序，以探

討是誰以任何形式的所有權之下來控制媒介組織。舉例來說，斯帕克斯認為由學者塞伯特等人(Siebert et al., 1963)所提出的古典媒介模式中，有兩種模式是無法適用的(蘇維埃模式與自由主義模式)；因為經濟與政治權力在這兩種體制中是如此地相互糾纏。因此，這些體制永遠無法真正形成對照，因為不管在自由主義或極權主義的媒介體制中，媒介組織的基本組成都掌控在菁英的手中。對於斯帕克斯來說，權力是比較重要的，不論媒介組織的控制者究竟是處於由國家資助的範疇抑或是商業的範疇。

在上面論述中所表列的四種媒介模式，一般來說是將焦點放在媒介體制如何與掌握執政權的政府其閱聽人產生關聯。葛瑞伯(Graber, 2005)發現根據媒介組織取得新聞報導的方式來將其分類，藉此以一種些微差異的方式來理論化這些媒介運作的過程，是相當有幫助的。然而這樣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其實與學者塞伯特等人(Siebert et al., 1963)提出的分類方式有所重疊；但是葛瑞伯的分類方式提供了另一種在不同體制中比較媒介組織的方法。葛瑞伯將新聞媒體劃分為四種模式，它們分別為：鏡像式(mirror)、操作式(operational)、政治性質(political)與專業性質(professional)(參見表 1.3)。在鏡像模式中，新聞應該單就只是反映現實。在組織模式中(類似於管理研究中所發現的組織理論)，新聞被認為是從內含於組織運作過程與媒介組織之目標的壓力中所產生的。政治模式認為新聞應該反映個別記者以及他們所屬之媒介組織的意識型態偏差。最後，專業模式假定新聞的產製應該被視為高度專業技術的投入，目的是為了尋求創造能夠吸引消費者與公民的新聞。

葛瑞伯的分類模式在理論化有關新聞是如何被產製的問題上相當有幫助的，特別有助於探討媒體環境如何形塑媒體產出的內容(也就是之前提過那個三階段步驟模式中的前兩

項階段)。然而，這些模式比起塞伯特等人(Siebert et al., 1963)所提出的分類模式，則顯得稍嫌狹隘；在這當中，所謂的政治模式並沒有真正將媒體必須在其中運作的廣大政治脈絡納入考量。而這樣的論述在理論化有關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時，也遺漏掉了前述模式中的第三項組成基質，也就是閱聽人。然而，由葛瑞伯所描述的這四種模式，的確呈現了四種多元但卻可供觀測的形式，表現媒介組織在真實世界中的運作。

還有兩種額外的媒介模式，呈現一種稍嫌不同的關係，在這當中，媒介組織在政治場域中扮演的是比較不被動的角色。有些美國的報紙以民主—參與的(democratic-participant)模式來進行試驗，在媒體與閱聽人之間取得更為平等與互動性的關係。當我們在思考網路於政治場域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時，這種模式就特別地有關聯。「公民」新聞學的概念，就包括召開例如市鎮會議(town meeting)這樣的行動，目的是為了激發政治興趣。然而相關研究顯示，從相對性的角度來看，即便有市鎮會議或網路論壇這樣額外的誘因，我們要驅使閒散的公民是有其困難的。另一方面，所謂發展民主模式(developmental democracy model)探討的是讓媒介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更為不平等，採取的方式是賦予媒介組織權力，使其能夠壓制某些特定的事實，並且扭曲其他的資訊，目的是為了試圖支撐新興的民主體制。舉例來說，這樣的運作方式可能包括當記者瞭解到行政體系中存有不是那麼嚴重的貪污事實時，考量到這個體系的領導者是真正地試圖建構民主的機制，因而會對這些輕微的貪污事實視而不見。然而，發展民主模式的重要問題在於要推翻這樣的體制是很容易的，一旦這樣的體制被推翻了，就能正當化由菁英所把持之不民主的權力鞏固；而非被群眾用來作為表達意見的最終管道。而當大眾的意見輿論有可能被暗中破壞時，刻意扭曲議題的決

11 表 1.3：新聞產出的模式

模式	定義	優勢	缺失
鏡像式	新聞應該要反映現實。	新聞的產出是不會被扭曲與受到偏差的。	不實際。無法報導所有事件。新聞產製者必須選擇報導的焦點、強調、過濾新聞，要不然將會有資訊超載的情況發生。低估政治性的偏差與壓力。
組織式	新聞來自內含於組織運作過程與新聞組織目標的壓力。	由許多媒介組織的不同產出提供了證明(特別是跨國研究的比較)。記者的觀察認為他們受到了組織因素的限制。	不去考慮事實，但真實事件仍會對新聞造成影響。低估了政治性的偏差與壓力。忽略了記者可能會秉持與組織行為相對立的專業規範。
政治性質	新聞反映的是個別記者以及媒介管道的意識型態偏差。只有擁有高社會地位、贊助媒介體制的人才能被新聞報導；那些不支持這種體制的人會被忽略或遭受抨擊。	對政權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從某些媒介組織取得的證據特別能夠有效地適應。	新聞成為壓迫的有力工具。忽視現實事件仍會影響新聞的事實(極權體制除外，因為在這樣的體制中會出現相當廣泛的操控，以致於這些真實事件都不會受到報導)。
專業性質	新聞的產製被視為需要高度專業技術的投入。事件是依重要性來選擇的，舉例來說，對媒介閱聽人與取得平衡的吸引力。	消費者導向且無政治意義的。	擁有專業技巧的人員可能會過濾掉不愉快或不受歡迎的重要新聞。遺漏了公民責任的要素，例如聽取無聊但卻關鍵的經濟政策或競選活動。可能會降低媒體的素質來迎合閱聽人。

資料來源：摘自 Graber (2005)

定總是會令人感到煩惱。而這也涉及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方法是否能正當化其目的；而民主制度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存在，又能否被建立起來。

然而，這些模式都帶出了大眾媒介應該要在公民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不足為奇地是，幾個世紀以來，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哲學家，同時此問題也是許多相關書籍的討論主題(某些二十世紀重要的經典著作為 Dahl, 1989; Habermas, 1989 以及 Huntington, 1991)。雖然我們清楚對於究竟是什麼構成民主制度的觀點是具有文化特定性的，但大部分的批評仍同意在推動公民社會的過程中，媒介組織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雖然學者達爾(Dahl)將民主制度認知為一種理想而非一種治理的實際模式，但他仍將意見表達的自由、媒體自由以及意見表達的權利視為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因子。哈伯瑪斯(Habermas)認為媒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公眾可以就政策進行辯論與討論，隨著這樣的過程他們也持續地塑造更好的社會。杭亭頓(Huntington)將媒介視為教育性角色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一旦公民們接受更多的教育，民主制度就會有更好的機會。然而，就哪些構成所謂的「教育」而哪些實際上只是「宣傳教條」，相關論述也有不同的定義；這些定義的變化不只是隨著政權體制的類型而有所改變，甚至在秉持相對類似之政治意識型態的國家之間，也會有所不同。

這也就是學者哈林與曼席尼(Hallin and Mancini, 2003)藉由比較不同媒介體制所探討的問題，他們也嘗試將這些媒介運作時的角色套用在政治場域中，而他們所使用的討論方式，比起四十年前學者塞伯特等人所使用的方式，是更為精細的論述方式，同時也可能是較有用的。根據哈林與曼席尼的論述，塞伯特等人在《新聞媒介的四種理論》中所提出的觀點，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所提出的所有模式，除

了蘇維埃模式之外，其模式本身的特質在許多民主國家中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哈林與曼席尼主張塞伯特等人所提出的這四種模式，因為與實際性之比較研究的關聯較微弱，因此這四種理論，「就像恐怖電影裡的僵屍一樣，幾十年來都偷偷尾隨著媒介研究發展的景象，超越了本身的自然生命」；而我們有必要「發展出基於現實比較分析的一種更為精細周延的模式」(Hallin and Mancini, 2003: 10)。藉由採用北美與歐洲的政治體制，哈林與曼席尼建構了以下幾種模式：自由主義模式(the liberal model)、民主統合模式(the 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與極化的多元主義模式(the 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參見表 1.4)。

如同哈林與曼席尼對他們所提出之模式所做的定義與檢證，我們逐漸瞭解要有效地比較完整的媒介體制是相當困難的。此外，他們發現商業化與全球化的力量在不同國家的媒介體之中，正引領它們走向所謂「大量的聚合與趨同」(considerable convergence)；使我們更難去建構可以在單一國家中分析媒介與政治場域的模型(ibid.: 12)。雖然他們所提出的三種模式，提供了我們對現今媒介體制是如何運作的，有更細微的理解，同時這三種模式也是基於現代的研究；但在我們試圖去定義那些在比較性的脈絡中，用來解釋媒介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模式」究竟為何義時，我們也會發現這些模式的限制。本書將提出這些模式，並且將它們挪用作為理解有關媒介與政治關係的廣泛概念之辦法。然而，通常來說，與此比較有關聯的是，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這三種媒介與政治關係之基本層次的特定組成基質，即媒介環境、內容以及閱聽人；而這必須在比較性的脈絡中來觀看。舉例來說，(有些時候)比較英國廣播電視公司與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的戰爭報導，可能比起談論一般媒介組織在戰爭報導中的整體角色還要來得更有啟發性。

表 1.4：哈林與曼席尼的媒介模式

13

模式名稱	定義	奠基的國家
自由主義模式	市場機制與商業媒介的相對主導。就相對性而言，國家在媒介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比較微弱的。	英國、愛爾蘭、美國
民主統合模式	商業媒介與聯繫於組織性與政治性團體的歷史性共存。國家的角色相對來說是活躍的，但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	北歐大陸
極化的多元主義模式	媒介組織整合進政黨政治中，就歷史的發展來說，商業媒介是比較衰微的。國家在媒介組織中的角色是強大的。	南歐的地中海國家

資料來源：Hallin and Mancini (2003)

肆、閱聽人的研究

當政治新聞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在閱聽人的面前時，這些群眾會如何反應呢？有許多研究，包括學者貝爾森等人(Berelson et al., 1954)所做的研究，都忽略了媒介消費者容易受到宣傳手法煽動的觀點。相對而言，閱聽人與媒介訊息之間的關係，被認為是一種複雜且具有互動性質的連結關係。然而，必須特別注意到的是，要單獨隔絕出媒介訊息所帶來的影響是困難的，因為在一連串的政治影響力中，媒介訊息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這也使得整個過程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就事實而言，人們會傾向選擇支持他們既存之政治觀點的媒體。大部分的人從他們

可得的媒介管道中，追求的是能夠確認自己觀點的訊息，而非挑戰自己觀點的訊息。儘管如此，有許多方式可以評估媒介訊息對閱聽人所造成的影響(而這些方式也將在之後的章節中做更細部的討論)。採用焦點團體的研究方式(focus groups)可以鼓勵人們以更為敘述性及更深入的方式，來談論他們是如何受到大眾媒介對他們所施加的政治性影響。此外，還有許多既存的大眾意見調查，要求接受調查的訪談者回答他們使用媒介的經驗與反應。在觀察存在於閱聽人因素中的變項時，這些調查變得特別有用，例如與政治新聞相關的因素，如群眾對新聞的用法、信任、興趣、偏好、喜愛或討厭的地方。很清楚的一點是，要瞭解群眾的心理，不只意味著必須考量短期的反應，例如對使用負面宣傳手法的候選人感到厭惡；還包括必須概念化長期的社會化影響，例如普遍來說媒體是如何報導政治的。

伍、評估媒介自由

在這個問題中，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媒體本身究竟是否對民主制度有貢獻，或者實際上媒體根本就在幫助壓制人民的政治自由。在某些時候，對媒介自由的迫害是相當明顯的，例如在中國的大眾媒體必須面臨明確的審查制度，或者像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中，有相當多的記者因為不明原因遭到謀殺。然而，在其他時期中，要比較媒介自由中的某些更細微因素，是更加困難的。有許多非政府組織(NGOs)記錄了不同程度的媒體自由，並且固定回報不同的政治體制就這個問題的處理是如何運作的。舉例來說，「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固定會出版年度的媒體自由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針對全球許多國家之媒介體制本身所包含的不同要素進行評比，評比的標準範圍從所謂的「完全自由」(completely free)延伸到所謂

的「完全不自由」(uncompletely free)(www.freedomhouse.org)。這個組織以美國的華盛頓特區為基地，檢視各個國家與媒介組織相關的法律自由、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這些區塊，並且根據觀察的結果給予每個評比的國家一個分數。就他們的觀察結果來看，他們認為所謂的媒體自由絕對不是普遍性的。在其二〇〇五年的調查中，針對全球一百九十四個國家與地區進行評比，自由之家認為在這些國家與地區中的媒體，有百分之三十九是自由的，百分之二十六是部分自由的，而百分之三十五是不自由的。就美國與英國的媒體來說，這兩個國家的媒體是被評比為自由的，其各自在全世界的排名分別是第二十九名和第三十四名。至於俄羅斯，其媒體自由度的排名是全世界第一百五十一名，且自由之家將俄羅斯歸為媒體不自由的區域。至於北歐的三個國家(芬蘭、愛爾蘭與瑞典)，被自由之家評比為擁有全世界最自由的媒介體制；而北韓則被評比為全世界媒體最不自由的國家。

但如同這些排名所呈現的，在這些評比的體制中，包含西方價值的偏差，然而這種現象是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因為自由之家本身就完全是冷戰的產物。另外，「國際無國界記者組織」(the International NG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www.rsf.org)也編纂了年度的索引，這份索引是以五十二項影響記者個人本身(包括謀殺、監禁、身體的攻擊與承受的威脅)與新聞媒體(審查制度、議題的充公、新聞搜索、騷擾)的因素為評比標準。針對這類事件，這個組織進行一份從二〇〇三年九月一日至二〇〇四年九月一日的調查，並將美國評比為全球一百六十七個國家中的第二十三名，將英國評比為第二十九名。在這裡我必須再一次強調，這個組織仍認為北歐國家的媒體是最自由的，而北韓的媒體是全世界最不自由的。

雖然由自由之家與無國界記者組織所發佈的評比，可以讓我們就各個國家與時間進行比較，但是通常困難之處在於要如何有意義地對媒體自由度進行量化，因為對媒體設定的規範，

會隨著國家的不同而有相當大的變動。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國際性組織，也會定期針對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媒體現況發表研究報告。舉例來說，「國際特赦組織」(the Amnesty International)會固定發表有關迫害媒體自由的警示與報告；而「網際網路新聞」(Internews)這個機構也會有類似的報告。此外，「無國界記者組織」也會製作一份個人的「黑名單」；在這名單上的個人剝奪了新聞記者的人權，讓新聞記者的人權遭受了大規模的迫害。二〇〇五年七月，這份名單表列侵害記者人權的個人，散佈在以下的國家中：阿根廷、孟加拉共和國、哥倫比亞、甘比亞、幾內亞、馬拉威、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與秘魯。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在某些明顯由國家完全掌控媒體的地區中，相對來說對記者的迫害反而比較少(例如中國與烏茲別克)，雖然在這些地區中的記者比較容易遭到逮捕與監禁。「保護記者協會」(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曾經發表過一份名單，首次列出全球對新聞媒體最不友善的十個敵人(在二〇〇一年五月的名單中包括了俄羅斯總統普丁)。在二〇〇五年五月，同一個組織發表了一份全世界對記者「最殘忍」的前五名國家，分別是：孟加拉共和國、哥倫比亞、伊拉克、菲律賓與俄羅斯。

陸、本書的內容

本書作為一本以比較性觀點來介紹媒介與政治的著作，涵括了許多重要的主題。就像任何教材一樣，本書並無法參閱涵蓋所有在這個領域中的相關研究，特別是因為政治傳播這個領域本身就是沒有邊際的，其橫跨了政治科學、社會學、管理研究、電影研究、英語等範疇。因此，本書章節的設計意涵，是希望能夠給予學生對這個領域的某些主要論述與分析有基本的理解。在這些章節中，大部分的章節都是環繞著包含美

國、英國與俄羅斯這三項核心之個案研究建構而成的知情討論(informed discussion)。然而，討論網路與研究方法的章節則採取了稍微不同的研究方式，其組織的方式環繞較多國際性的概念，並且著重比較不同的範例。每一個章節都有一節導論，呈現主要章節內容之主要概念的標題、每一個部分之核心論點的概要、本章的總覽以及與本章之研究素材相關的討論問題。另外，每個章節都有一個部分，提供針對此章主題更深入的閱讀材料與網路上的資源。在這裡我必須提到的是，網路上有許多非常棒且令人感到興奮的討論空間，可以讓我們尋獲更多資訊來分析，甚至是有關比較媒介與政治的原始資料(raw data)。本書所表列的網站，之所以會被選擇，一般來說是因為這些網站提供了進一步研究和分析的重要資源。只要有所幫助，本書也納入一些總結關鍵概念與資訊的圖表。

本書所涵蓋的核心主題，為形塑新聞產出的力量，包括單獨一章討論新聞記者專業與公共關係。此外，本書以比較性的觀點關照閱聽眾；媒介與選舉；媒介與戰爭；媒介與恐怖主義；網路在政治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介紹媒介與政治此領域的研究方法。作為主要溝通工具的網路，也成為貫穿本書討論的主題。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構思的基礎都來自於教授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媒介與政治課程的經驗。此外，本書也採用了許多研究專案計畫，包含在最近美國、英國與俄羅斯選舉陣營中，有關恐怖主義威脅之形成的比較研究；俄羅斯媒體自由之終結的十年期研究；跨越前蘇聯之媒體自由的比較研究；以及召集十三位學者對網路與政治場域之新近發展的觀察。

柒、本書的架構

在本章的介紹之後，第二章與第三章各自著重討論於三階

段媒介與政治模式的第一個因素，也就是媒介產出與環境。這兩章特別針對討論「新聞產製模式」(the News Production Model)的要素，其將新聞產出的過程理論化為經過一連串的過濾系統，從政治環境、媒介規範、管制與媒介管道的所有權。在最後一個階段或「篩檢系統」中，新聞的內容會受到記者專業之特質以及公共關係之成果的影響。透過產製新聞的過程，圍繞這一連串階段之概念來組織媒介環境的研究，讓相關學科的學生與研究者可以由跨國性的觀點來探討每一個因素。

第二章將討論政治與媒介環境、媒介規範、管制與媒介所有權的問題，並透過美國、英國與俄羅斯這三個核心的個案研究來探討。在這些探討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差異，有助於比較與對比在公民社會之建制過程中，媒介產出之力量的適切角色。「新聞產製模式」使我們可以概念化新聞產製過程中不同因素的相對衝擊，針對人們所見、所讀與所聽，作為新聞的日常基礎。以比較性觀點來討論新聞產製過程的模式，同樣也可以使我們篩檢單純敘述性質的新聞，並在分析新聞產製中的政治角色時，將重點放在不同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上。

第三章的討論內容，則轉向執行新聞報導專業之人這個引發關注的主體：即所謂的記者，或以較為廣義的方式來說，也包含公共關係的專業人士。在某些國家中，記者擁有某些既定的專業運作技能，但其對新聞產製的觀念在不同的國家中卻有相當大的變化。在美國，「客觀性」這樣的概念，被高舉為新聞從業人員的標準，同時也是理解美國新聞記者本質的重要方式，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也會受到威脅。在英國，新聞從業人員的標準，卻在一種如同精神分裂般的體制中，被訴諸為所謂的「平衡」而非「客觀性」；在英國的媒介文化中，電視被視為必須遵循高標準，但是某些印刷媒體卻一再揭露八卦與醜聞。在俄羅斯，定義記者的最好方式或許就是將他們視為政治與經濟體制的人質，雖然某些記者藉由作為政治力量的發聲管道而

在自身的權利中獲得權力。不同的專業記者規範，特別是那些自我審查的規範，在不同的國家與媒介體制的記者中，會如何發展？記者必須面對的危機為何？例如在英國廣播電視公司報導政府參與伊拉克戰爭爆出缺失，而重要的消息來源自殺之後？第三章的內容將提供有關記者這個職業的資訊，例如新聞產製與呈現的過程，以及在不同國家之間會有什麼不同。隨著公共關係顧問與報導者之間的關係持續發展，是否堵住了比較沒有組織(以及比較沒有良好財力的)聲音呢？

第四章探討媒介的閱聽人，採用美國、英國與俄羅斯對媒介消費者的研究，來探討新聞消費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本質。有趣的是，對於媒介閱聽人的研究經常是被忽略的。雖然媒介環境與內容的差別是顯得較為明顯的，但它們與閱聽人的關係之本質在某種程度上仍是被隱匿的。我們都瞭解媒介對新聞的處理方式會產生某些影響，但我們應該如何定義這些影響呢？在不同的媒介與政治體制中，這又代表著什麼呢？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媒介管道，以及在同一個國家中的不同媒介管道，其對新聞之處理方式的層級以及獲得的信任都會不同。這個問題究竟是否重要？如果人們對公共電視體制的信任開始腐蝕，這又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人們會如此信任媒體，更甚於許多其他的政治體制呢？不同區塊的閱聽人，與大眾媒介都有相當不同的關係。某些閱聽人因為媒介所提供的資訊而獲得權力，某些閱聽人是冷漠的，而還有某些閱聽人所看、所聽與所讀的訊息，都被隔絕於政治範疇之外。瞭解這些細微的差異並且對其進行跨國比較，將使我們概括地對媒介與政治的關係獲得更好的理解。

第五章討論選舉與媒介。媒體在晚間新聞報導候選人與政黨的方式，對於尚未決定的選民來說，相對而言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此外，多數國家中都有許多管道，讓政黨與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內，透過有償或無償的方式在電視上亮相。本章就

此問題比較與對照了採取自由主義模式的美國以及英國的體制，美國的情況是，在選舉期間中，候選人與政黨會砸下大量的經費到電視的政治宣傳上；而英國則禁止候選人與政黨在電視頻道上播放付費的政治宣傳廣告。除了這些討論之外，本章也討論了俄羅斯的大眾媒介是如何阻礙政黨政治的發展，並且也討論這些大眾媒介如何破壞民主選舉制度。重要的是，我們不只要探討大眾媒介在選舉中是如何能夠破壞而非支持民主制度的，我們必須就俄羅斯這個特定個案來探討，同時也必須以廣泛的比較性觀點來思索。選舉陣營究竟是賦權於公民呢，還是單純只是使公民變得遲鈍呢？

第六章討論與分析媒體對戰爭的報導，特別探討為什麼在民主體制的國家中，媒體對戰爭的報導會被以相當特別的方式來控制。戰爭報導的方式，從面對戰爭之特派員的「越南模式」(Vietnam Model)，發展到一種在軍隊中被規訓、自我審查的「波斯灣戰爭模式」(Gulf War Model)。本章追溯了這些發展，其導致戰爭衝突的報導中顯著下降的開放性與自由度。本章特別著重於英國於一九八二年福克蘭戰爭中(the Falklands War)對媒體進行控制的先導性原則，以聯營系統、自我審查制度以及訴諸於目前佔主導優勢的國家主義，來馴服這些戰地記者。本章也將涵括針對美國與英國在伊拉克軍事活動之新聞報導的討論。最後，本章也將戰時「控制性」自由媒體的概念，與發生於車臣(Chechnya)完全的新聞管制與廣泛的人權迫害相互比較。

至於有關恐怖主義的報導，則引發某些與媒體在涉及戰爭和國家安全時相同的議題，然而，恐怖主義更對大眾媒體帶來特殊的挑戰。本書在第七章所要討論的，就是恐怖主義在國家安全與大眾知情權利之間，形塑了莫大的緊張關係。這種情勢非常複雜，因為恐怖主義者同時瞄準了閱聽眾與暴力行為的實際受害者，因此在恐怖主義者本身的結構中，將媒體變成非自

願的參與者。雖然英國的媒介組織已經與北愛的恐怖主義團體協商了幾十年，美國的媒介組織自從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攻擊事件後，面對的卻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威脅概念。本章所採用的研究素材包括以焦點團體訪談，瞭解自九一一攻擊事件以來，美國大眾對持續不斷的恐怖主義新聞報導如何回應；同時也包含在二〇〇五年七月倫敦爆炸案後，對英國的焦點團體進行訪談的發現等相關研究。就上述這兩個主題而言，美國的群眾幾乎以同樣的程度，表現出挫折失望與愛國主義的情緒。另一方面，英國的群眾看起來就比較能夠迅速在政治性的脈絡中討論恐怖主義的問題，他們長期習慣於在北愛爾蘭的政治架構中進行恐怖主義問題的討論。美國群眾持續支持在國家安全與有助於言論自由的開放性兩者之間的平衡，儘管他們只有對恐怖主義的成因稍微進行了一點反省。有鑑於作為一個更傾向社會責任模式運作的媒介體制，英國媒體的使用者似乎為了社會團結的利益，而比較偏好對媒介組織施加更多的控制。然而，針對俄羅斯的相關研究，顯示出俄羅斯的群眾與媒體被困在對車臣恐怖主義者產生仇恨與不良印象的循環中(同時也針對車臣的平民)，只留下最極端的政治選項，要不就是選擇俄羅斯軍隊，要不就是車臣的軍隊。

雖然網路是貫穿本書之特定脈絡討論的主題，本書的第八章與第九章採取一種深入的觀察，探討網路在政治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第八章將討論網路的「公民」面向，分析作為美國、英國與其他國家民主進程之一部分的運作方式。這將包含網路研究之核心理論，在民主制度、網路作用與群眾對網路之態度等層面中的分析。包含闡明政府、政黨、社會團體與其他行為者，試圖使用網路來建構他們所認為更好的社會與公民之個案研究。第九章以不同的方式探討網路在政治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藉由分析網路對抗議示威運動與政治反抗運動所蘊含的潛能。這也包括了去觀察中國的「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網

路系統，因為它是一個由國家所控制之多邊網路的模式。此外，本章也將審視恰帕斯運動(the Chiapas movement)中網路所扮演的角色，另外也將觀察車臣的戰爭以及烏克蘭橘色革命(the Orange Revolution)的形成。本章也將評估有關恐怖主義者使用線上世界之效益的相關證據。

本書第十章所設計的內容，是為了讓這個領域的學生與研究者，對於研究媒介與政治的核心方法能有一快速的導讀。本章首先針對媒介與政治研究假設之形成提出快速指南，讓研究者能夠將其想法轉化為有效的研究設計。本章也討論了在這個領域中重要的質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入訪談、焦點團體，以及廣播、印刷出版與網路內容的分析。此外，本章也提供了對量化資料的簡短指引，特別提出如何使用民意的資料來理論化媒介與政治範疇之間的關係。

最後，本書的第十一章將提出每一章主要發現的簡要總覽與回顧。結論特別將強調跨國比較媒介體制的價值，因為這是為了瞭解媒介與政治之間的重要互動。

19 問題與討論

- 為什麼藉由研究不同國家的媒介體制來瞭解一般媒介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可以有所幫助？
- 描述並討論所謂的三階段模式，即媒介產出、內容與閱聽人。
- 自由主義式模式的媒介體制，其優缺點為何？而在社會責任模式之下運作的媒介體制，其優缺點又是如何？
- 學者葛瑞伯與其他人所提出的媒介模式，是以何種方式協助我們對新聞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有更好的理解？
- 研究認為群眾如何受到大眾媒體影響？
- 非政府組織如何追蹤與分析世界上各國媒體的自由度？

進階閱讀指導

如果要對美國的體制有更好的綜觀理解，包括許多可讀資料的事實資訊與理論性觀點，參見葛瑞伯(Graber, 2005)。若要參考英國的體制，參見麥克奈爾(McNair, 2003)或奈葛林(Negrine, 1994)。如果要探討俄羅斯體制的問題，參見歐慈(Oates, 2006)。若想進一步探索更多關於媒介和政治關係的理論，可參考賽伯特等人(Siebert, 1963)以及葛瑞伯(2005)。哈林與曼席尼(Hallin and Mancini, 2003)提供了一有趣、具時效性的討論，探討了在比較脈絡中的媒介模式。奈葛林(1994)討論的英國脈絡中的媒介模式。如果欲瞭解有關媒介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概念，參見斯柏克斯(Sparks, 2000)。在同一系列的編輯書冊中，學者班奈特(Bennett, 2000)討論了有關媒介與政治的有趣概念。這套編輯叢書本身(Curran and Parks, 2000)提供了一系列優秀的媒介體制概述。而剛特與穆漢(Gunther and Mughan, 2000)同時也在他們編纂之有關民主與媒介的書籍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觀點，特別是在第一章的內容中(由 Mughan 與 Gunther 所著)。

網路資源

www.cpj.org

保護記者協會是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發表年度對新聞媒體待遇最糟的前十名上榜名單。其也發表了針對媒體迫害的其他報告，包括在二〇〇五年對媒體「最殘忍」的五個國家。

www.rsf.org

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目的是為了替記者與其他媒體工作者與專業人士，在進行工作時遭受監禁或迫害而辯護。其經常發佈相關記者受到威脅的警示與報告，並且也編纂針對媒體自由的年度索引報告。

www.freedomhouse.org

自由之家是一個非營利、非政黨派系的組織，根據其網站，其創立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替全世界之民主與自由清晰發聲」。它也發表有關全世界媒體自由的年度報告。

www.people-press.org

普優民眾與媒體研究中心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是一個非營利的研究組織，提供許多有關美國媒體、大眾與政治的調查資料與報告。其網站提供了許多有助於寫作學術論文的報導與資料(可供自由下載)。

www.annenbergpublicpolicycenter.org

賓州大學的安納堡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特別著重於研究媒體與政治場域之角色的政策中心。

www.fair.org

公正與精確報導組織(Fairness and Accuracy Reporting, FAIR)的年度報告，針對權力如何形塑媒體報導的內容提出觀點。

www.amnesty.org

國際特赦組織是一個爭取人權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其工作的內容也包括編列濫用媒體權利的名單。

www.intenews.org

國際網路新聞是一個國際性、非營利的組織，其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獨立的媒體並且在公共利益的場域中推動開放的溝通政策。

參考書目

- Bennett, L. W. (2000) "Media Power in the U. S. ." In Curran, J. and Park, M.-J.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ystems* (pp. 202-20). London: Routledge.
- Berelson, B., Lazarsfeld, P., and McPhee, W. (1954)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urran, J. and Park, M.-J. (2000) "Beyond globalization theory." In

- Curran, J. and Park, M.-J.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ystems* (pp. 3-18). London: Routledge.
- Dahl, R.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raber, D. (2005)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7th edn.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Books.
- Gunther, R. and Mughan, A. (2000)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Oxford: Polity.
- Hallin, D. and Mancini, P. (2003)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 McNair, B. (2003) *News and Journalism in the UK*, 4th edn. London: Routledge.
- Mughan, A. and Gunther, R. (2000) "The Media in Democratic and Non-democratic Regime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In Gunther, R. and Mughan, A. (eds.)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2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grine, R. (1994)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Britain*,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 Oates, S. (2006) *Television,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in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 Patterson, T. E. (1994) *Out of Order*. New York: Knopf.
-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ebert, F. S., Peterson, T., and Schramm, W. (1963)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parks, C. (2000) "Media Theory after the Fall of European Communism: Why the Old Models from East and West Won't Do Anymore." In Curran, J. and Park, M.-J.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ystems* (pp. 35-49). London: Routledge.